

会计口述历史  
王庆成  
2021.7.19

## 编者按：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庆成老师是我国著名的会计学家，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会计系，同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52年提前留校执教。在长期的财会教学和研究生涯里，王庆成教授为建立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及有关课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诸多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影响的学术观点。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几年来多次与他联系口述记录，终于有幸在2021年7月19日完成了对他的口述采访。贺南轩、夏乐书、王化成、张为国、乔元芳、邵瑞庆等老师为促成对王庆成老师的口述记录提供了帮助。因《会计口述历史（第三辑）》最快也要在2022年年中出版，为了尽快与读者见面，我们单独发出了本口述文稿以雍读者，也以此表达对王庆成老师的特别敬意。

## 王庆成（1927—）

男，出生于江苏镇江，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会计系，同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1952年留校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财会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时间：**2021年7月19日上午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王庆成老师家中

**工作人员：**

项目负责人：尹成彦

现场工作人员：

访谈 / 冯凌

摄影 / 尹成彦

摄像 / 赵健

美术编辑：路勃



2021年7月19日上午，采访现场合影。

- ▶ 2021年10月24日，王伟旦根据录音整理口述第一稿。
- ▶ 2021年12月10日，赵健根据口述第一稿整理口述第二稿。
- ▶ 2021年12月27日—2022年1月5日，赵健、尹成彦、侯娟娟对口述稿作出多次校订。

### 从小学到中学

我1927年8月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曾经在安徽的安庆念了小学一年级，在南京念了二年级，到连云港念了三年级和四年级。连云港城外有一座白虎山，风景非常优美，我们经常到那儿玩。但好景不长，1937年，我刚读完四年级，日本鬼子来了。连云港靠海，日本鬼子很快就要过来了。我妈妈是扬州人，我姨妈嫁到了扬州乡下的丁沟镇。我就辍学跟妈妈、姐姐到了丁沟。后来爸爸没有了工作，也去了丁沟。我们失学，爸爸失业，没事干。因为他语文、历史的基础很好，就开始教我跟我姐姐读四书五经。每天早晨吃了早饭，给我们讲课，讲完了我们就背书，下午就是写大字，晚上一般就念书。星期天要写一篇文章，我爸爸会批改、写评语，讲哪儿好哪儿不好。从1937年到1939年，我在丁沟待了两年。

这两年我没有上学，但是我的语文打下了基础，对我很有帮助。

两年以后就进了扬州城，上了达德小学、震旦中学。这两个学校是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我们选择它们就是因为这两个学校不是日本人办的，不学日文，但要学法文。教会学校办学非常认真，有个老师叫张一飞，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给我们讲古文，讲得非常好，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张一飞还教我们音乐，他听我唱歌不错，就让我在做礼拜的时候唱赞美诗。到了期末，因为我赞美诗唱得好，他给我音乐打100分，一分也不扣。我语文学得很好，唱歌也不错。

1942年年初，我爸爸到浙江去工作，我就到浙江去了，就读于浙东第二临时中学。这所学校是绍兴附近的金华等地流亡的老师、学生组建起

来的，学校的老师都挺好。当时学习很正常，但也有的科目没有老师，比如没有音乐老师，有时候也缺数学老师。大家都很活跃，除了上课以外，也编报纸，我们还搞汉语、英语演讲比赛，我还经常得第一名。元旦还演话剧、歌剧，我也上台，我演老头，演商人，在学校很活跃。因为是在抗战期间，有的时候还半夜紧急集合。抗战胜利以后，我到福建浦城念了一年半，1947年后我就考上复旦了。

### 复旦大学

我在考大学的时候，我报考了复旦大学、上海商学院，还考了一个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没有考上，是因为我把题目弄错了。其实没有录取正好，因为中央大学是国民党的嫡系学校，后来就被合并掉了。如果被录取，我以后路径就不一样了，我也不会到人大来。后来我还被江南大学录取，因为江南大学是后备的，当然没必要去了，复旦大学更好。

我为什么要考复旦会计专业？首先因为抗战的原因，我考不了理工科。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学校大部分时间没有数学老师，我数理化不好，就没办法考理科。另外，我姐夫曾在暨南大学念会计，当时我还有个亲戚在上海开了个颜料行。家里说你不如学会会计，会计比较实用，复旦大学的会计学也有名，毕业以后工作也好找。这个专业是我爸爸给我报的，我也同意。也不是说一定要学会会计，但是学了也觉得还不错，会计这个学科是很实用的。

当然念了会计之后，我也觉得很不错。会计是比较实用的学科。比如商学院商学系市场营销这种学科本身就没什么东西，会计看起来简单，但要深也可以学的很深入，写论文也能写，所以我选择了会计。

到复旦大学以后，内战已经开始，校内正反面势力斗争得很厉害。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被选为系学生会委员。反面势力的学生想要占学生会重要的位子，就请我们到校外的茶馆里开会，我们不肯去。后来有一个叫柯彬的进步同学被选为会长。

当时校学生会发起了一次捐募寒衣活动，但是反面势力的学生不同意。他们说要去就以个人名义去，不能以学生会的名义组织。这也是政治斗争，宣传反动派统治下的老百姓吃不饱、穿不好，衣裳都没有，生活很困难。他们也知道这是一种政治斗争，所以不让学生会参加。

我们刚到复旦的时候就发生了“于子三事件”。于子三<sup>1</sup>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反动派下毒手把他装在口袋里，扔到钱塘江里去了。学生们都不干了，上海的学生都上街游行。

在复旦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这些书，毛主席的书我们都能看到。我们当时在书上多加一个封面，比如《西游记》《水浒传》之类的，不敢把书名露出来。

1. 于子三（1924年—1947年10月29日），男，汉族，原名为泽西。爱国主义青年，1947年9月，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并担任该社浙大农学院分社负责人。1947年10月26日，在杭州大同旅馆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1947年10月2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23岁。1982年4月2日，浙江大学立“于子三纪念碑”，并把纪念碑所在的“华八斋”前面的广场改名为“于子三广场”。他被秘密杀害的消息传出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29个大中城市15万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罢课示威，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斗争持续两个半月之久，形成全国规模的“于子三运动”。

2. 1949年4月26日，国民党当局对上海市17所大专院校同时发起大逮捕行动，学生被关押在达人中学。后大部分人经过多方营救陆续获释，其余人被押至虹口监狱直到5月27日苏州河北全部解放才获得自由。



1951年6月复旦会计系51届毕业生

第一排左起 张宝善 龚仲鑫 金增禧 雍家源 沈学钧 袁际唐  
第二排左起 刘诚 郑之棧 陆颖箴 吴文瑞 朱毓纯 龚形梅 王庆成  
第三排左起 吴如竹 陈澹清 李梅圃 江祖法 祁明德 李国业 刘厚生  
第四排左起 曹麟章 蒋国标 徐吉昌 樊发祥 王梓贤 杨厚舆 庄仁寿

在复旦期间，还遭遇了“四·二六大逮捕”<sup>2</sup>。上海是1949年5月份解放的，当时南京也快解放了，“四·二六大逮捕”的时候实际上国民党当局已经垂死挣扎，快完蛋了。有天半夜外头有枪声，就引起我们警惕了。本来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不准备放枪，但走火了。天亮就听见外面敲门，我去开门，宪兵拿着手枪逼着学生出来，把我们都关到食堂。天亮以后，宪兵让学生排队出来对名单。当时也有国民身份证，宪兵看国民身份证核对名单，如果上了黑名单就抓走，没有上黑名单的，如果有特务指了也会被抓走。那一次复旦一共有83个人被抓走了。当时我们有一个教授叫周谷城，他是有名的进步人士，也被抓走了，还是校长章益把他保出来的。这83个人本来是要被下毒手的，国民党走了就想把这些人干掉，但最后不了了之。还算幸运，八十多位同学都活下来了，但这事让

国民党的凶面目全都暴露出来了。

后来解放军半夜进城，白天休息，我看到他们全都是在马路上睡的。苏州河北面是后来解放的，在河的对面有个百老汇大厦，现在可能叫北京大厦，就在黄浦江东边，当时有国民党军队开枪，负隅顽抗。

解放以后，我们一批同学随着南下的解放军做服务团，会计系有6个人，去成都有三个、重庆一个、云南一个、河南一个。大家革命的劲头很好。现在还有一个河南的同学健在。

抗美援朝以后国家号召青年工人、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校，大家也很踊跃。我们会计系报名了17个人，我也报名了，后来批准了10个人。有一个同学汪廷杲，当时是团支部书记，本来没

有批准他去，临走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家里有事不去了，缺少一个人。所以组织头天晚上就跟他说话，说缺人了想把他补上，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不去也不会批评他。他二话没有说，第二天打起铺盖就去了。

我当时是四年级，马上就要分配工作了，因此没有被批准，一年级的同学刚刚入学，也没批。我写了一篇文章《抗战英雄、同窗楷模》，讲述了这10个同学的事迹，他们都是好样的。

复旦原来的系主任叫张光禹<sup>3</sup>，他是广东人，临解放的时候去了香港，后来我到香港见到他了，跟他有来往，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后来雍家源先生当系主任，我是团支部书记。那时候我们系里面还没有什么党员。学校里要干什么事，党团干部每个月要布置工作，我就告诉

系主任。我临毕业的时候还特地回学校看了一下雍家源，跟他关系还挺好的。所以我回来以后，葛家澍他们搞《会计经典丛书》，我就推荐了雍家源的《政府会计论》。《政府会计论》是丛书里面最厚的，我曾经建议有的账表可以删减一点儿，但是郭道扬<sup>4</sup>说一点儿都不要删。后来我还写了雍家源先生的传略《梅花香自苦寒来》，这篇文章登在上海的《新会计》杂志上，雍家源的儿子雍小楼<sup>5</sup>提供了一些资料。雍家源在政府会计界是了不起的，他搞得很深入，他那个时候虽然搞政府会计，同时还在学校里教书，他跟国民党并没有什么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当我们系主任。

我和复旦的同学们之间现在还有联系。在北京的有任家和、徐基晋、何平贤，在上海的有曹麟章，还有福建的龚雨莲，北京复旦的校友会过去每年都聚会的，现在岁数大了，就不再去聚。

我还有好多同学在上海。复旦本来没有会计系了，是后来恢复的。在香港的一个校友捐了钱，他要我去当会计系主任。我到香港的时候，老系主任张光禹请我们吃饭，他亲自跟我谈。可我那时候已经过了60岁了，都快65岁了吧。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我岁数已经比较大了，我的同学们也都老了，如果要当系主任就要请老师，我的熟人也来不了。我说你原谅我，我当不了，我在北京各方面的关系都搞得挺好，到了上海还要



1987年袁际唐<sup>6</sup>老师托同学带的照片



雍家源

3. 张光禹（1912—1993年），1941—1948年期间担任复旦大学会计系系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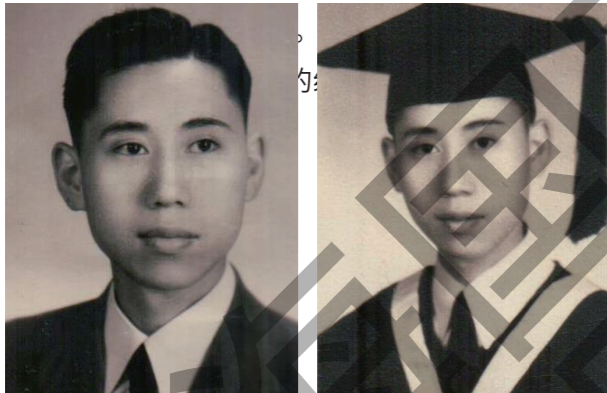
4. 郭道扬（1940—），湖北人，我国著名会计史学家。1964年毕业于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执教于中南财经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会计学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

5. 雍小楼（1930—），男，雍家源长子。1950年考入复旦大学会计系，因院系调整1953年毕业于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后从事其他行业教学等工作。

6. 袁际唐（1907—1989年），男，浙江省鄞县（现宁波市鄞州区）人。教授，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中国所得税会计的早期研究者，我国所得税会计学科的奠基人。

重新开始，特别是同学们都老了，我到哪去找老师？后来我就把这个邀请辞掉了。

过去大学生不是自己找工作的，在复旦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统一分配。毕业的时候是1951年，少数同学尤其是家在上海的，怕被分配到别的地方去。当时上海市很重视这个事，就在交通大学开了一个学习班。本来团支部都是按系组织的，后来把全部毕业班的同学组成了一个团总支，我是总支委员，就是为了做统一分配的工作。放假以后，大概是7月份，大家到交大上学习班，华



1951年摄于上海

当时上海有13所学校有会计系，这些系组织了一个分团。我在其中当一个小组的组长，兼分团的书记。大部分同学经过学习思想通了，在会上要求100%服从分配。学习班快结束的时候，我还代表分团发言。没几天就分配了，不管你是到北京，还是到乌鲁木齐，车票都是公家买的，敲锣打鼓送我们上火车。分配时，说我可能是在上海当助教，也可能到人大当研究生，我就跑去问到底去哪。正好人大有个叫石楚玉的老师在，她说给他们吧，所以后来我就被分到人大去读研究生了。

现在的火车速度真快，那个年代还是很慢的。我们从上海来的时候，头天傍晚走，第三天上午才到北京，我就睡在两个椅子底下，在地上睡着。从复旦到人大的有好几个同学，有许崇德<sup>7</sup>、黄顺基<sup>8</sup>和余学本<sup>9</sup>。

### 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時候创办的。学校校区当时是很分散的，没有一个集中的地方。有个校区在西郊但还没有盖起来，都在胡同里面。我1951年去念研究生，贺南轩也是那年去的。刚报到是到板桥胡同，后来住在白米斜街。到了人大，我先念研究生，但没有多久就被调出来搞教学了。我们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课都是苏联专家讲的，有翻译；中国革命史是胡华<sup>10</sup>讲。我来的时候苏联专家跟每个同学都见了面，问了名字，后来我调出来了，工业会计就没有上苏联专家的课。他们对预算会计不熟悉，也就是指点指点，就不可能很深入了。我们讲稿写好了，这一段讲10分钟，这一段讲15分钟，这一段讲多少分钟，最好讲完就刚好下课，我们对时间控制得挺好。有时候苏联专家也会问，你说讲15分钟怎么讲了13分钟就结束了，这个没法回答他，也就是随便聊聊。我和马卡洛夫跟高德洛夫也有些接触，但不是太多。当然他们还是很不错的，他们是来贡献、来讲课的。他说在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时候，他也是研究生没有念完就出来教课了。他当时写的《会计学原理》后来对我们还很有用，我们写书的时候还参考他的东西，但是后来就联系少了。

1955年以后来了一些越南留学生。我们有些会计的老师也曾到越南去当专家。越南留学生上的是农经专业，不是会计专业，但是也学会计。因为他们听不懂，我住在城里，晚上都要去辅导。学校有个辅导室，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就过来问，第二



1957年5月4日，王庆成同越南留学生在颐和园联欢，共唱越南歌曲。

天要实习的话，必然会有问题来问。

“文革”的时候不开课了，都到江西五七干校去了。那个时候人大停办了，到五七干校大概是1969年，在那里待了三年。我一开始是养牛，这是照顾我，因为不养牛要开荒，养牛要轻松一点儿。后来我们的会计走了，我就当了两年会计。再后来复校了，专门开了会。过去我们都是在财政系里面，有时候是教会计课，没有会计专业，“文

革”以后首先是教了会计专业，后来成立了会计系。

苏联会计对我们会计其实影响不大。刚开始用过他们的书，但苏联会计对我国后来的会计发展影响不大。财务课的苏联老师叫毕尔曼<sup>11</sup>，他上课的内容和我们的财务管理关系不大，但是对我们开财务管理课有促进作用。以前我们没有开财务课，他来时候我已经当老师，但有时候还去旁听。他的财务课侧重于部门财务，后来我们自己写的是企业财务，以企业为主。毕尔曼的书叫《国民经济部门财务》，部门财务实际上是国家财务，比如说教育部、司法部的财务，或者是工信部、商业部的财务，实际上就是财政。这些部都有财务司，财务司拿着财政的钱，应该也可以叫财政局。那个时候美国的教材不能用了。人大在培养各个学校的会计老师，好多老师都来人大学习，像毛柏林、王松年、汪家祐，还有东北财大夏乐书，比较系统的教学，对各校会计教师的人才培养起了一些作用。后来慢慢的会计教材也中国化了，中国搞自己的东西了。

人大商学院有会计系，也有财务系，有硕士生、博士生，后来我也带了研究生。会计研究的东西可以很深入，比如说像市场营销之类的学科到了研究生阶段就没那么多东西讲，会计研究的东西比较多。另外会计人也比较团结，会计学会搞活动也比较多。以前会计学会的《会计研究》，我们都是编辑，给他们看稿，到现在每期还给我送

7. 许崇德（1929—2014年），男，青浦人。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宪法学泰斗。

8. 黄顺基（1925—2016年），广西昭平人。著名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

9. 余学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曾任国家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命题组组长，北京地区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试卷评卷组组长。

10. 胡华（1921—1987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党史研究专家。原名胡家骅。参与成立了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后改称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任常务副会长。

11. 阿·M·毕尔曼：苏联经济学家，世界级的学者，是苏联顾问团中主要的财政专家，他所创作的《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1953年出版）是苏联教育部审定和推荐的这门学科的第一部教科书。在华期间，他帮助中国建立了苏式财务管理模式，一直到2000年前后，交通产业、物资流通产业的财务运作体制仍然是毕尔曼当年设计的。

两本。现在我不是兼职编辑了，过去每年每个月都送一篇稿子给我，让我们审查哪些能登，哪些不能登，能登的帮他们改一改。有一个人当时在军营，他写内部利益怎么分发，跟厂内经济合作制有些关系。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但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我就指导他怎么改，改完以后我就建议他发表了。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系。当编辑时我跟作者建立了不错的交情。

我还是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的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副主任是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的校务委员。他们学校开会都请我去。那个时候的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比较低，会计函授学校原来是山西办的，办得还不错。财政部就接手了。后来写教材我就不参加了，让我们学生写。教材编纂委员会的教材让我们审一审，他们对我们还挺客气的。

在人大有几件大事很值得纪念。一个就是毛泽东主席关心研究生的学习负担。当时我们的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都是苏联专家讲，中国革命史是中国人讲。马克思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都看原著，什么《反杜林论》，还有好多马列的书。那个时候也不用买书，都是到图书馆借了再还，但指定的书目非常多，内容也都很深，大家吃不消。后来有一个研究生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毛主席亲自批示了，他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阅读分量减少 1/3，请吴玉章<sup>12</sup>校长处理后告诉我。”当时人大校舍很分散，只有在活动时学生才集中，毛主席的批示贴出去之后，大家觉得很温暖，也很感动。

第二就是 1952 年学生生产实习，在北京东门开了一个动员会，晚上开的，大概 7 点开始。我们老校长吴玉章都七十多岁了，岁数大了，大家

就没有告诉他。吴老正好看了当天的校报，上面说今天要开生产实习的动员会，他自己就来了。他说业务学习很重要，我一定要来。而且大家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下去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这就引起大家对业务的重视。刚教学的时候，让我讲预算会计。预算会计还没讲完，因为农业会计的老师要调去苏联留学，又让我讲农业会计，农业会计我也没有学过。我当时要和侯志刚一起去农场，所以这个会也参加了。我看到吴老一个老人家这么晚了还亲自来，很感动。另外吴老每个学期开学头一两天都要到学校的各个校区去探望巡视。当时人大的校舍很分散，在东郊的房子没有盖好，校舍都是在胡同里头。他看到有部分学生住在海运仓校区外面的民居，好多老师也住这里。但是学生说住在外头，一天因为吃饭至少要来回跑三次，还要上课，十分不方便。吴老马上说，学生搬到海运仓校内，校内的老师搬出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第三件事是成仿吾<sup>13</sup>校长开全校教师会，动员大家学外语。那是“文革”以后的事了。他说你们一定要把外语学好，这很重要。他自己八十多岁了还翻译马列的经典著作。他说外语不但要学好，而且要翻译得准确，比如说有一个口号，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人翻译成“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翻译不仅没有了阶级性，而且意思完全背道而驰了。外语一定要精通，通了之后才可能翻译得好。人民大学对学外语很重视，在 1953 年就搞俄文暑训，暑假一个多月不放假，就是学俄语。白天学，晚上学，礼拜天学，外面人不能进来，里面的人不能跟外面联系，也不能打电话。但经过这么一个多月，俄语进步很大了。我的英语是在复旦的时候学的，入校以后就是用英文版的教材，在人大把俄语也学下来了，

还翻译了书。

## 学术成就

我的学术观点主要包含 5 个方面。

### ·首创“财务管理学科独立论”

我提倡财务管理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个是我首创，在全国提议成功了，是我学术思想里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首先，财务管理学不仅是一门课程，还应该是一个学科，是一个专业，就好像数学，哲学，企业管理，财政这样的专业。但一开始不是这样。我 1947 年到 1951 年在复旦上学，会计系没有财务课，只有一门课叫做企业预算，也就是财务计划。到了人大，有会计课，但没有开财务课，听说上海交大有，但是大部分学校都没有财务课。后来人民大学来了一个专家毕尔曼，他到财政系就讲财务课，但他的书是《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当然他来对我们是有功的，原来我们没有财务课，现在开了财务课了。但他讲的部门财务是从财政的角度，比如说工业部、商业部、教育部的财务，实际上讲的是财政，至少是苏联财政体系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这种企业财务，并没有完全讲到。后来我们中国人自己写了一本《工业企业财务管理》，是从企业的角度讲财务。

我一开始是教会计的，预算会计、农业会计、工业会计都讲。后来有人生病了，我就替他讲财务管理。因为教学需要，我也写了一本《企业财务》，写得比较简单。“文革”以后我的重心转向财务管理，带的研究生也是财务。

我在搞教学的时候，就觉得财务不但要开一门课，而且内容还很深，应该设一个专业，它跟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一样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我跟别人一起写了《建立和完善新的财务管理学》，呼吁要把它设成一个单独的专业。后来我跟另外两个老师，以我为主，执笔写了《建立和完善新的财务管理学》，发表在人大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里面。这篇文章第一个小标题就说“财务管理学是一门独立的经济管理学科”。慢慢地在学校里，有些同学、老师就同意了。但是要把财务管理搞成一个学科，阻力还是很大。

第二，会计管理不可能替代财务管理。财务管理成为一个学科，阻碍还是很大的。有人说财务管理是财政学里的，有人说是金融学里的，还有人说是会计学里的。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的系主任是阎达五<sup>14</sup>，我们是要好的朋友了，他提出“管理活动论”，简单说是会计管理包括财务管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会计管理概论》，开宗明义讲了他的观点。他说从财务的本质来讲，理论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信息系统论，一种是管理活动论。他主张管理活动论，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管理的对象是资金运动，会计

12. 吴玉章（1878—1966 年），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他于 1950 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时担任校长长达 17 年，直至 1966 年逝世，为人民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3. 成仿吾（1897—1984 年），男，湖南新化人。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党内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1937 年任陕北公学校长，1939 年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1978 年 7 月至 1983 年 6 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14. 阎达五（1929—2003 年），男，山西省祁县人。1949 年 3 月肄业于北平私立华北文法学院经济系，1954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创办人、第一任系主任。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管理活动论的主要创始人，价值链会计的首创者，《会计研究》编委会副主任。

管理的职能有这么几个：会计预测、会计决策、会计预算、会计核算、会计控制、会计分析和会计考核。通常对资金运动的预测、决策、控制、考核，都是财务管理的事情，等于会计把财务管理都吃进去了。我不同意他这个观点。

厦门大学的葛家澍<sup>15</sup>老师，上海的娄尔行<sup>16</sup>老师，都是主张信息系统论，认为会计是提供资金运动的信息的。我们就提出都是管资金运动，都是管筹钱，募集资金，投资，支出，收入资金，分配资金，但财务是管理资金运动的实体，而会计是反映它的信息的。马克思也说过“生产跟记载生产的簿记终究是两回事”。

第三，教育部把财务管理列入了高校的专科目录。我们写了文章之后也送给教育部，也跟教育部高教司有关的负责人说了我们的意见，他听了有道理。后来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的一个目录里，财务管理学跟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还有其他的人力资源是并列的。现在本科、硕士、博士都有会计专业，很多的大学、财经学校，包括北大、清华，还有上海交大，上海复旦、同济都有财务系，承认它是一个学科。所以最后我的“财务管理学科论”就站住了脚，而且对于推动财政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 ·开展财务管理学体系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的体系理论界分成三类，第一个是理论体系，第二个是学科体系，最后是课程体系。

第一种就是财务管理学的理论体系。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总的基本对象是研究资金运动的规律性。财务管理研究的主要是企业单位的资金平衡，比如资金的筹集、资金的筹划、资金的支出、资金的收入、资金的分配，它有些规律性。具体理

论体系大概有这样一些：财务管理的职能。财务管理的主体，有企业、有行政单位、有事业单位，还有其他各种单位。财务管理的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对财务管理都有影响，甚至于来了疫情了，对财务管理也有影响。还有国外环境、国内环境、气候环境。财务管理的目标，你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为了赚钱。财务管理的原则，按什么原则办事。要研究财务管理的主体，财务管理的体制，还有财务管理的方法。财务管理的本质是资金的运动，要研究资金运动的规律性。理论界因为要开学、开课或者是写书，要专门讨论这些问题，这是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

第二就是学科体系，这也是理论界研究的问题。作为学科体系要研究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是财务管理对象的规定性。财务管理总的对象是资金运动，但是运动过程里面有资金筹集、资金使用、资金耗费、资金收入、资金分配、资金运用，有些不同的活动范围。第二是财务管理环节。比如说财务管理要预测，有财务计划，有财务控制，有财务分析，还有财务检查这么几个环节。当然会计也说会计预测，会计不参加预算，它都是事后记录的。一般环节就是预测、决策、计划、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财务检查这么几个。要开课也可以，财务预测学、财务控制学、财务分析学也可以。第三是财务管理主体的规定性。从所有制来说，就有全民所有制的，有集体所有制的，有个体的，具体的财务管理就不一样，还有国营的，中外合资的，这又是不一样的。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也不一样，就要针对不同管理主体的规定性。第四是财务管理层次的规定性，比如说总公司、分公司、场部、车间，甚至于说班组，它也有不同的层次。

第三就是课程的体系。会计管理要代替财务管理，它要把我们压下去。现在商学院有会计系，

也有财务系。贺南轩他就说会计就是财务管理，会计包括财务管理。也有人说对财务活动的管理就是会计管理，贺南轩专门写了篇文章，标题就是说《会计就是财务管理》。我写了《建立和完善新的财务管理学》，第一个标题就是“财务管理是一门独立的经济管理学科”。我跟贺南轩是同一年到人大的，他从南开来，我从复旦来。这个课程体系并不是说开一门财务管理学就可以了，设立课程体系可以有三种方法。一种是按国民经济的部门设立课程。比如工业财务管理、商业财务管理、外资企业财务管理、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等等，根据不同的单位性质来设立。比如教育部让我们培养财务人员，就要着重讲学校的财务，完全讲企业的就用不上。还有给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讲财务管理，对象也不一样。这是一种方式。按照部门主体来分，还有一种方法是按财务管理的内容设置课程，比如说筹资管理、投资管理、成本管理、分配管理等等。第三种就是按管理环节分设课程，比如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财务检查等等。到底采取哪种方式，则要根据学员的身份、办学单位的需要、办学单位的条件来决定。

#### ·倡议“国有企业财务自理”

首先，国有企业在理财权益上有什么特点？我国长期以来全民所有制，财务是没有什么自理

性的，就是国家拨款，国家投资，利润全交，亏损弥补，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独立的财务管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跟管理权是可以分开的。私营企业所有权跟管理权是统一的，我出钱我管；全民所有制都是一些大中型企业，也是国家出钱国家管，就是说财政拨款，怎么花、怎么分、怎么用，财政都管，盖什么宿舍、车间，都管了。所以我们提倡全民所有制企业应该能自筹资金，自理收支，在一定程度上自计盈亏。国有企业当然是主要靠国家拨款了，但也应该可以向银行贷款，甚至可以请外方参加一部分投资，应该可以自筹资金，自理收支，收支财政就别管了。比如说成本开支范围，过去财政部专门有文件，哪些东西能够进成本，哪些东西不能进，投资怎么投，都有规定。过去利润全分配，亏损在一定程度上补助，后来就搞利润留存，实际上留得也很少，也是根据过去留存资金，来计算一个留存的比例。国有企业也应该有利润的，虽不能说完全自负盈亏，也要适当地留一点。盈利用于两方面，一方面用于企业发展，另一方面用于职工福利，有了亏损的也应该要弥补。财务应该在筹资、投资分配方面有一定的权限。

后来中央有个意见，企业要有一定的理财权，至于这个界限怎么划分再讨论。早期国有企业是没有财务自理的，就是国家拨款，国家决定投资，利润全缴，亏损也是国家补。当然了，既然利润全拿了，赔了钱就吃大锅饭了，这样子调动不了

15. 葛家澍（1921—2013），男，江苏兴化人。1945年在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为我国第一批经济学（会计学）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第一和第二成员、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专家咨询组成员。2013年11月25日在厦门逝世，享年93岁。

16. 娄尔行（1915—2000），男，1937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同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院深造，1939年毕业于，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MBA）。1939年至1949年先后在“国立”上海商学院、私立光华大学、“国立”临时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自1950年起，先后在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学院“文革”期间关闭，后来复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授，并担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主任、名誉系主任。娄尔行是我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会计学家之一，是新会计学体系的主要创始人，为推动中国会计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积极性。

第二个就是企业财务管理改革要进行基本模式的变革。邓小平同志南行谈话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了很大的变化，财务管理也有改革，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阶段。我们要求转变观念，更新知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企业财务管理改革的构想》，在这里面提出一些意见。

一是建立企业资本金制度。过去的时候，我该给你拨钱了，就拨你多少，现在要建一个资本金制度。就是说要建造一个汽车厂，或者是船舶厂或者是纺织厂，根据需要应该要多少资金，建立一个资本金制度，要有资本金管理办法。如果资本金不够了，还可以向银行贷款。二是要改革资金管理的办法，从来源上不再分固定资金、流动资金。过去有固定资金，比如说资金来源是固定资金，就只能用到固定资金上面。流动资金不够用的话，固定资金不能用。银行贷款已经给固定的企业资金了，就该让企业自己花。因为会计科目上也有固定资金、流动资金，固定资金放在这没动，但流动资金不够这钱还不能动，要去银行贷款。这是第二点建议，资金的管理要能够灵活一点儿。三是改革固定资产的划分和折旧的办法。很多人建议固定资产单价应该提高一点儿。比如“文革”以前，假定单价500元就可以是固定资产，现在东西都贵了，就要把固定资产的单价提高。折旧的办法也应该改变，可以提快速折旧，就是说折旧还是10年，但是头一年、头两年要多提，先用的东西比较新，它的价值也比较高，早点儿提，这就叫快速折旧。最后是要完善利润分配的办法，要实行汇率分流、税率分流、税后还债、按资分红。给国家上交了所得税以后，上交的比

例要有个合理的确定，让经营得好的企业能够多留一些利润。总体上来讲，就是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有利于它发展经济；国有企业要财务自理，就是说它有一定的自主自理权。

### ·构建“企业内部经济核算制”

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企业内部经济核算制有的时候就简称“厂内经济核算制”。

第一个就是企业内部经济核算制的由来。“文革”时经济很混乱，管理也没有一定的规则，大家都非常不满意，“文革”以后国家希望拨乱反正，经济走上正轨，国家经委跟财政部就组织人大工经系跟会计系到大庆去调查，当时工业学大庆嘛，我们是搞财务管理，工经系管别的。大庆搞了一些办法，比如说到总部去领材料，并不是说开个领料单就能领来了，而是要领用什么材料，单价多少，值多少钱，用内部的货币付钱，这样工人就知道这个东西值钱了。车间里面老虎钳子坏了，要去领一个，如果要收钱，那老工人一看就说这个还能用，咱们再用个半年。领东西要付钱，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半成品，交库也算钱，这样就可以增产节约，少领东西就少花钱，生产得好就多给钱。这样一比就有内部利润，有内部利润就可以奖励，赏罚分明。大庆每个星期六开结算会，我们也去参加。那个时候还叫不出名字来，但是我们也说了一下“油田内部的经济核算制”。

后来国家经委跟财政部搞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调查，我也参加了，去三个省，主要是北京内燃机总厂，清河的毛纺厂，还有首钢。大庆油田搞内部结算他们也了解，去北京内燃机总厂就明确是调查财务管理。他们也有一些财务管理的办法。比如说车间里面，有的时候把材料领得很足，积压在那儿，材料是要保持一定的周转的，不能说

月初就把大半个月的材料都领来，压在这个地方，那资金就浪费。引入内部结算制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领材料要付钱，领工具也要付钱，甚至夏天领降温的水也要算钱。过去老虎钳坏了要领一个，尽管还可以用也不管，一定要新领一个，现在要算钱，工人就觉得起码还可以用两个月。生产出来的东西去交货，原来写个收货单就完了，现在按计划价格交了多少货就是多少钱，就是你的生产成果，这样大家就重视了。过去的生产任务，到时交点东西就行了，不看交了多少，现在要看质量，要验收，最后就能够算出来收入，这个当然不是真正的利润，是内部利润。内部利润就要求增加收入，减少支出，自计盈亏，这对车间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后来还有物质奖励，最后各个指标都完成得很好。指标要分解，产量、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材料消耗都有指标，指标完成得好，到月底、年底就有鼓励。那就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了，大家就有积极性了。

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在在大庆的时候还不完整，只总结了“指标分解”“核定资金”“内部结算”“自计盈亏”这4条。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把厂内经济核算制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五项要点：即“指标分解”“核定资金”“自计盈亏”“内部结算”和“物质奖励”。指标分解就是产量、质量、品种。核定资金就是说原材料或者在产品要留多少。内部结算，就是买东西要付钱，交东西要收钱，那个时候有不同做法，有的叫内部货币，有的是转账，也有的搞内部银行，所以像成都它叫做“厂币核算”，吉林叫“内部银行核算”。自计盈亏就是自己有收有支，就可以比出利润了。当然这个利润跟厂子里面算出来的不一样，也没有税金，有的开支也不算，是根据现状算出来收支，这样就自己可以和自己比了。然后是物质奖励，利润多就给你多，指标完成得好的也给你多。当时国家经委副主任听了后觉得还挺好，给我提

了意见。我原来没有叫“自计盈亏”，我写的是“自负盈亏”。他说你改个名字叫“自计盈亏”吧，继续努力把文章理论完善一下，北京内燃机厂的职工说你这是红5条。我写的文章在《财务与会计》上发表了，是用第一人称说的北京内燃机总厂的经验，所以署名时他们处长的名字放在前头，我的在后面，这个无所谓了，反正实际上是我写的。后来国家经委定了一个《国有企业经济核算条例》，就把这5条吸收进去了。这一下子全国都需要，那个时候全国各地都到北京学经验，开始是个别介绍，后来多了没办法了，到大礼堂放录音。

后来在一定时间里“厂内经济核算”在中国到处推广，当然这个叫法不一样，有的叫“厂币核算”，有的叫“内部银行”。后来邯钢叫“内部市场结算”，就是说内部也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车间与车间，仓库跟仓库，也跟厂与厂一样，亲兄弟明算账，模拟市场核算。其实说得也有道理，就是把市场经济的原则用到厂内了。厂内经济核算制当时在全国推广，后来我到成都，他们也搞，后来还开会找我去讲这些东西，推广得很广。当时中央有一些负责人也都挺支持这个办法，实际上就是把市场经济这些东西引到车间了，等于一般的都是大企业，变成车间跟车间，科室跟科室，车间跟厂部好像是外部的关系了。亲兄弟明算账，但是它经济效益很好。

第二是经济核算制的做法。做法就是这5条：“指标分解”“核定资金”“自己盈亏”“内部结算”和“物质奖励”。后来各个部办研究班有经济核算这个课，都请我去讲。那个时候有纺织部、外贸部、工业部、商业部、冶金部、机械部、交通部等等，他们都办了研究班，凡是讲核算都请我去。

第三就是经济核算制的准备，主要讲理论准备。有一年《财务与会计》找我说让我写一个纪

念毛主席关于经济核算的论述，我就看毛主席关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的文章。他强调上面要统一领导，下面要调动积极性，要有物质奖励，要分层管理，要有一些措施，也谈到核定资金，基本上把这5条的意思都讲到了，我很受启发，这对我整理这5条很有指导作用。另外还有一些组织准备，你要制定内部的合同，内部赏罚分明。

厂内经济核算制在当时全国推广得很广，我也写了好几本书。我和天津的唐勋合写一本《工业企业内部经济核算制》，我自己也写了本《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我们在大庆也写了《大庆油田财务管理》，里面第一篇就写着油田的内部经济核算。当时在企业里面这还是很有影响，特别后来邯钢搞内部市场结算，也是这个东西，效果还是挺好的，在当时发挥了很大作用。

### ·我与政府会计的不解之缘

我学的是会计，工业会计、农业会计都学了，预算会计、财务管理也学了，本来政府会计在我心里也不是重点，但是后来它就脱离不了。我当时研究生没有念完，就把我调出来搞教学，教的第一门课是预算会计，讲了一个学期。当时寒假我在下面搞“五反”运动，刚回来就告诉我，说你一开学就要去讲预算会计。我们系主任开学讲的第一课，讲完了之后，他说他要忙了，下面让我讲。当时苏联的《预算会计》才翻译出来三分之二多一点，我讲前面的时候其实还不知道后面是什么东西。当时那些学生都是调干，都比我大，他们背后叫我小先生。这些学员还是很客气的，他们不当面这么叫，我们关系还是可以的。

教材后面的内容我不知道，翻译翻得也不好。会计科目一般是四五个字，有的就是直译，比如“为本机关支出用的国家预算拨付经费”，有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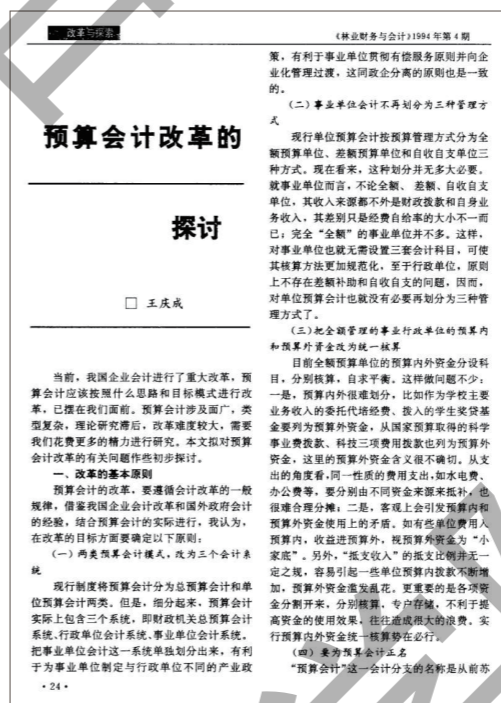
个字，我要背下来，不能16字的会计科目还要看书。后来教育部委托人大办高等学校财会人员的培训班，因为我教过，就让我来教预算会计。后来我在五七干校还当了两年会计。再后来搞预算会计没有人，预算会计研究会在辽宁成立，让我当预算会计研究会的副会长，管教研改革。这是偶然相逢，反而变成了终生的伴侣了。

关于预算会计，有些问题我提一下：

第一，我提出来要为预算会计正名。预算会计解放前叫政府会计，解放后也是叫政府会计，雍家源在复旦开的课就是政府会计。到了人大来是苏联专家指导我们，俄文书上叫预算会计。苏联专家说叫预算会计，当然就叫预算会计，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叫政府会计。据我知道在国外也叫政府会计，只有苏联叫预算会计。

“文革”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预算会计改革的探讨》，其中专门有个小标题“要为预算会计正名”。为什么呢？预算会计不能够代替政府会计。政府会计不仅是预算会计，当然很多都是列入国家预算的，但是还有一些政府基金，还有些事业单位，更不要说民办的、非营利，它也不是国家预算的。从政府来讲，也有一些基金是不列入预算的。在美国，《预算会计报告》是政府会计报告的一部分，就是说政府的收支不仅包括列入预算的，还有在预算外的。但是叫了几十年了，21世纪初，这个名字已经叫出来了，“预算会计”这个名字还改不掉。研究会叫“预算会计研究会”，杂志叫《预算会计管理》。但是它不确切。苏联专家说叫预算会计，我们就叫预算会计，就一直叫下来改不掉了，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

第二，预算会计的体系应该是个广大的体系。预算会计到底包括哪些？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



题。政府会计的主体就是财政总预算会计，就是财政部管的；还有行政单位的会计就是各级政府，比如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行政单位会计，他们直接跟财政总预算联系的。政府会计下面有政府总预算的会计，下面还有行政单位会计，还有财政托管资金会计，有政府性的基金会计，还有福利救济单位的基金会计。

第三，政府会计改革的一些要点。“文革”以后预算会计就要改革，预算会计研究会在昌平开了个会，成立一个预算会计改革的课题组，我是课题组的组长，因为我是预算会计研究会的副会长，而且有一个分工就是理论管理。我们到北京市昌平、怀柔等好多区去调查，也到广东调查。后来我们写了《修改预算会计制度的建议》在《预算管理》杂志上发表了。我写了一篇文章《论我国非企业会计组成体系的改革》，在《会计研究》上刊登了。总的来讲，理论界，包括实务界都同意把预算会计叫政府会计，因为预算会计范围窄，政府会计核算对象很明确。但是预算会计这个叫法因为叫惯了，现在还用它，我们有时候写文章

也避免不了。后来改革，我写了一个建议给财政部，财政部也很认可。有些地方非改不可，我建议有几个：

第一个政府会计的会计要素里面有一个净资产。企业那个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然后费用、收入、利润或者是盈亏，政府会计是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支出。净资产里面包括什么东西？它包括固定基金、事业基金、专用基金，还包括结余。这个里面固定基金、事业基金、专用基金是资产跟负债的差额，是登记在资产负债表上面；收入、支出的差额，结余是登记在收入支出表上，这两个东西完全性质不一样，你怎么搞成净资产？我到现在看到有的制度里面还是用净资产，我写过两篇文章都说要把这个改掉。这两个项目是性质不同的东西，混在一块了，人家笼统一看，看不清楚这个净资产到底指的什么。这个到现在还没全改过来，还是叫净资产，但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第二个建议就是政府会计里面有些单位要用权责发生制。行政单位大部分可能用收付制。现在规定的是用收付制，但是我们觉得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用收付制可以，事业单位，公办非营利组织，包括民办的，应该放开一点，要用权责发生制。有一次云南大学的校长跟我说，他说1年的教育经费是从9月份拨下来，9、10、11、12月，到年底结账，他花了4亿元，账上结余8亿元。过了4个月，他还有8个月要花钱呢，但省里面说他们老是说经费不够，还有8亿元的结余，交回来也罢。他有口难说，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就用权责发生制，拨下来12亿元，我说预收学费12亿元，每个月我转1亿元，到月底开支4亿元，还有预收的8亿元，那就不是结余了。就类似这样，权责发生制在政府会计里面，在一定范围内还脱离不了。我也专门写了文章，在《预



1981年，全国预算研究会上，王庆成（左）与田一农（右）合影

算会计》杂志上也发表了。

还有政府会计里面有些隐性负债也应该把它反映出来。有些隐性负债，不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欠了工程款没有付，甚至于买东西欠人家的款没有付，个别的还有拖欠工资，这是负债，但是它是不会在账面反映的。因为买东西有发票，负债没有人给你发票，是可以不登的，账上就没有反映，但是这个信息就失灵了。领导一看很好，你又不缺钱，收支都挺好。所以这个隐性负债应该暴露出来。

1981年，全国预算研究会成立大会在辽宁丹东召开，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被选为研究会会长，我被选为副会长。

### 退休后的生活

我的回忆录是在退休以后写的，文集汇编也

是90岁时印出来的，业务上的文章写得少，非业务的东西还写了不少。我写了一篇《两次聆听潘序伦先生讲话》，我们在学校时请他到复旦来讲话。有一次教育部讨论经济核算的问题，我也在复旦，把潘老也请来了。那个时候他可能85岁，陪他的一个学生都80周岁了。

还写了纪念雍家源老师的《梅花香之苦寒》，登在了《新会计》上面。另外写了几篇，写了一篇关于李达三的《崇尚自学，政教兴邦》，还有一篇是写复旦有一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审计的人。这几篇文章在我论文集上面都有的，就是潘序伦、雍家源、李达三，还有复旦的杨天全，还有闵庆全，都是退休以后写的。也写了一些诗，诗就放在回忆录后面。

### 我的治学之道

我的治学之道总的来讲就是“宁静致远、锲



而不舍、学无止境、学无捷径”。

第一，要有一个主攻的方向。研究的目标要专一，要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不能够精力分散，浅尝辄止。比如我主攻财务管理，同时难免也要讲别的课，比如讲预算会计和农业会计、工业会计、管理会计等等。但是我要抓紧主攻方向，深入地搞。

第二，在主攻方向明确的情况下，还要适当地、广泛地涉猎其他学科。学科之间都是有密切联系的，要相互借鉴。为学犹如金字塔，要能博大，又能高，基础深了才能高。

第三，搞教学要学习一些外语，要了解外国的动态，最好能够创造条件阅读外国的书刊。市场经济下面西方有一些东西，它的管理理念、管理的方法对我们是有用的，不能说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都不能用，比如西方美国或者说英国有些财务管理的一些办法、一些做法都可以借鉴。我

复旦入学时学的《初级会计》就是用的英文课本。到人大来学了俄文，还看俄文书，翻译俄文书，我在震旦还学了点法文。

第四，要做好信息收集、资料积累的工作，要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相同的意见要听，不相同的意见更要听。人家有不同意见，或者是你有毛病，或者是人家不行，这里面总有问题，不同的意见你更要听。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学者可贵的品质；海纳百川、博学众长，也是这个学者不可少的一种修养；聚沙成塔，厚积薄发，所以你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信息。

第五，要勇于开拓，勤于创新，与时俱进，日新又日新。对于新出现的东西要能够敏感，要重视它，要抓苗头，不能够总是跟着人家跑，要有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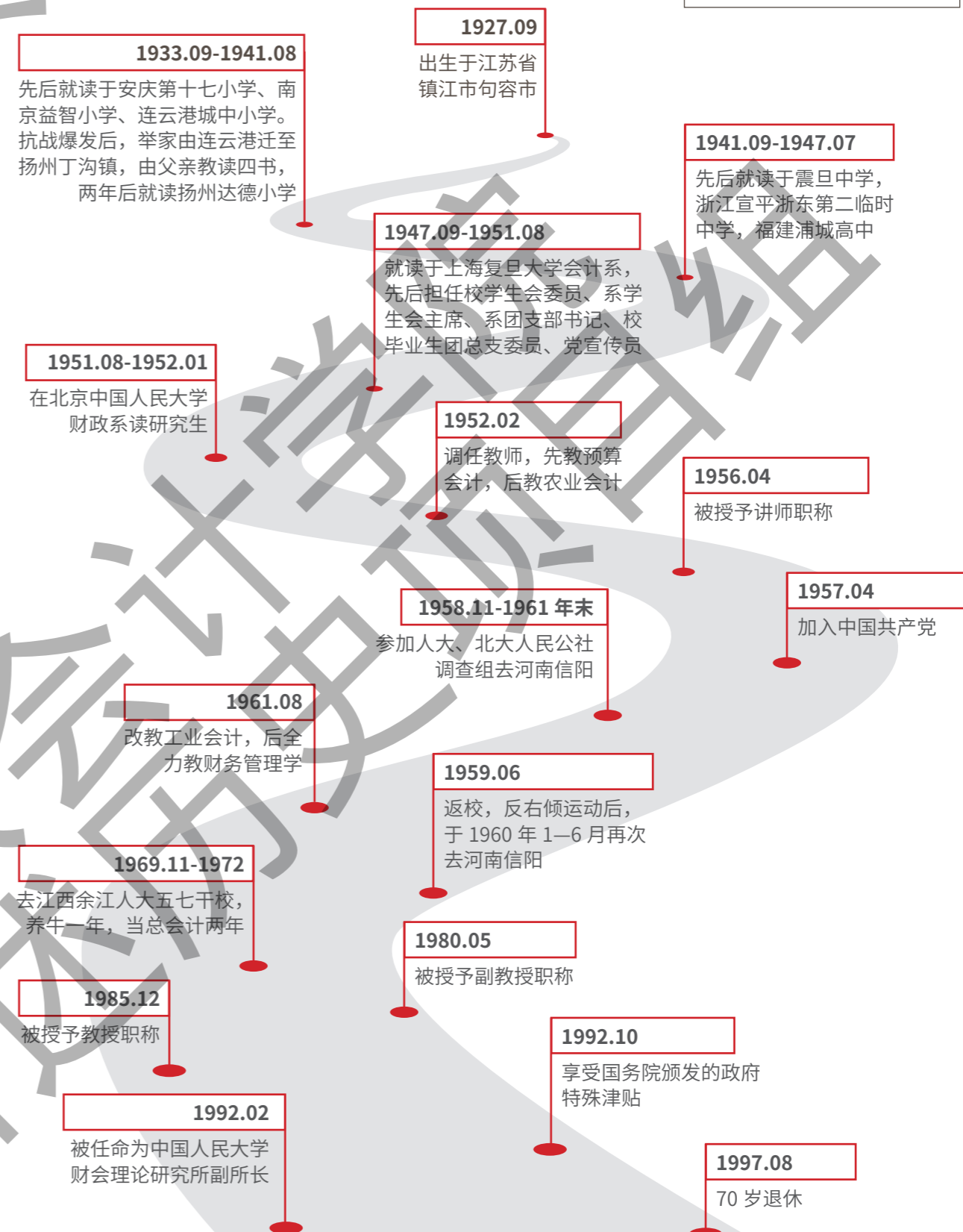
第六，为学要甘于寂寞，安于清贫，要做到

十年寒窗无人问，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要身居陋室，不改其乐，不为外界荣华富贵动心。

我在几十年的教学科研的事业当中教了许多书，我刚才讲过预算会计、农业会计、工业会计、财务管理、会计管理，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工作要跟国家整体的事业结合起来，只有把自己放在全国一盘棋当中，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什么搞财务管理，为什么要搞政府会计，那因为实际需要，实际需要你就去搞，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就是要服从事业的需要，我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有需要我就上。

我在人民大学已经有70年了，离开上海70年了，在这里我求学、成长，在这里我教书、育人，我对学校的感情很深厚，我对学校的发展也很有信心。学校7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4句顺口溜：求学从教六十载，拳拳不忘培育情，莘莘学子齐努力，人大热心又热心。这就表达了我对学校的期望，也希望学校发展得更好。

## 王庆成履历



## 王庆成主要著作

1977年8—10月

由财政部组织去大庆油田调查，集体写出《**大庆油田财务管理**》一书，公开出版，王庆成执笔第二章“钱物结合，管好用好流动资金”

1979年5—8月

参加国家经委扩大企业自主权调查组，去北内、清毛、首钢调查，写出《**北京内燃机总厂厂内经济核算制的经验**》报告，刊于《财务与会计》后又写《**试论厂内经济核算制**》，刊于《会计研究》

1981年2月

与李相国、顾志晟共同编著的《**工业企业财务管理**》出版，该书是“文革”后高校出版最早的一部财务教材，社会影响较大

1986年5月

为中央电大开设的《**会计学原理**》课程录像，此录像从1986年播放到1994年

1989年10月

《**建立和完善新的财务管理学**》一文获全国财务理论研究成果优秀奖，并获人大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科研成果奖

1990年11月

王庆成主编的《**预算会计**》出版，后改名为《**政府和事业单位会计**》，分别于1998年、2004年、2009年推出第1、第2、第3版

1991年12月

《**工业财务管理学**》一书，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993年11月

《**预算会计改革的探讨**》一文获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次年获中国会计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1999年2月

论文集《**财务管理理论探索**》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年10月

与郭复初教授共同主编的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财务管理学**》，获教育部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2009年1月

会计界传世之作《**会计经典丛书**》第一辑六本首次出版发行。王庆成被聘为该书编辑指导委员会委员